

后来，马耀年也成了我们的弟兄。国宝说，他对马耀年的好感，恰恰是因为他是学霸！我们后来才知道，他爷娘都是大学的教授。马耀年加入我们的“队伍”，除了感激国宝的“路见不平”以外，再就是为了寻求长久的安全吧？跟我们在一起，谁敢欺负他？

●我属狗，六十三啦，本命年那年，我女儿在新南华为我办了三桌寿宴酒，亲亲眷眷都来了，弄得蛮闹猛的，我这个“老寿星”当然也很开心啦！女儿孝顺，亲戚们看得起我，过来祝贺捧场，嘿嘿，开心啊！

日脚过得真快啊，一晃我居然成了花甲老头子，回想一路过来经历的人和事，除了爷娘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那三个兄弟了！

他们不是我的手足同胞，是我学生时代的结拜兄弟，我们兄弟四个的故事是很有说头的哦。

从头说起吧！先说说我家的情况。

我的爷娘四十年代从苏北农村跑到上海讨“生活”，他们没有文化、没有钞票，就靠出卖体力赚辛苦钱糊口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没有保障的。上海解放后，他们的命运有了转机，我爷成了环卫局的正式工人，国家每月按时发放工资奖金，还有各种劳防用品什么的，我爷笑不动啊，翻身感、自豪感立刻被激活了！他是厚道的实在人，不会说什么花里胡哨的话，只会用卖力干活报答毛主席、共产党，那个时候，老实人不吃亏的，我爷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，后来还入了党，单位还优先分配了一套“二万户”房子呢！我爷直到死都说：“毛主席好！共产党好！”我娘去的是街道的废品收购站，因为她年纪轻，身体好，单位就让她骑黄鱼车，那个时候没有卡车啊，黄鱼车是单位唯一的运输工具，我娘既是“驾驶员”，又是装卸工，我娘的手粗糙不堪，摸上去硬邦邦的，比男人还男人的手！到我工作以后，才体会到，我娘的工作是多么的辛苦和不容易！

我爷娘是解放后结婚的，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，我是家中的老四，我上面是一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下面是一个妹妹。那时候我爷娘要上班，这么多孩子照顾不过来，他们就把我和小姐姐送到苏北乡下我爷爷家，每个月寄给他们10元钱做贴补，我整个童年就是在苏北乡下度过的，农村小孩的皮、野、胆子大、邋遢，我占全了。因为我爷娘在上海工作，条件相比他们要好很多了，所以，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很羡慕我们家，别人羡慕的目光培养了我的自信和大胆，我在年龄相仿的孩子中很有号召力的，算是孩子王吧！乡下孩子的快乐与钞票无关，大自然的馈赠是我们儿时快乐的天堂！我带着他们爬树掏鸟蛋、下河摸螺蛳、抓鱼虾、上山采野果子，我那时才六七岁吧！

●九岁那年，我奶奶去世，我爷把我接回上海读小学。我在乡下“众星捧月”、前呼后拥的好日子也算过到头了。可怜我，长得黑不溜秋，说着一口苏北话，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，对我是明显的看不起，乡下和城市际遇的巨大差异让我一下子懵掉了，班上调皮捣蛋的同学以为我是可以随便欺负、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，他们伙起来作弄我，在我之前的经历中，哪有人敢这样对待我啊？最初，我是按捺住自己的野性和怒火，忍辱负重的，后来他们得寸进尺了，公开挑战我的忍受力了，我还是没有回击，而是抱着希望报告班主任说，某某、某某某欺负我。想不到这个混蛋老师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为什么欺负你呢？一个碗不响，两个碗叮当嘛，你管好自己吧！”

好吧，老师的不负责任“帮助”我成长了，讨不到公道的委屈化作愤怒，我开始自卫反击了！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了！我一拳打向朝我扔石子的那个同学，又一脚踢倒他的同伙，然后是一顿痛打！就是这顿痛打，打出了我的威风 and 名气，当然，也打出了我的麻烦。

两个熊孩子哭着跑到班主任那告状，刚才还说两个碗叮当的老师，现在却转向、变脸，相信一个碗也会寻衅滋事弄出响了。她虎着脸到操场呵斥我：“你简直就是个小霸王了！不得了了，在学校大打出手了，你以为这是你们乡下啊？”我也恼了，梗着脖子问：“他们欺负我，你为什么不管？”班主任没有想到我这个乡下孩子居然敢用这样的口气质问她，立刻火了！上来拖我：“去校长室，去校长室！”

我被她连拖带拽的到了教导主任办公室，班主任一通抹黑我的说辞让教导主任也义愤填膺了，两个女人对着我一顿呵斥、狂批！那年我还不到十岁，别看年纪小，可是我不服气、不买账啊！我大着嗓子说：“是他们先欺负我的，他们一直欺负我，你们为什么不管？我就该一直被他们欺负啊？”我这样说，她们说我态度恶劣，结果是，打电话去我爷单位，跟接电话的人说，某某的儿子闯祸了，让某某到学校来处理一下！”

五点多，我爷来了，她们颠倒黑白的告状让我老实巴交的爷气得不得了，先用我一个大嘴巴，然后是低三下四地检讨说，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，对不起毛主席，对不起共产党，还给学校添麻烦了……我爷的低三下四让她们爽了很多，脸色缓和了嘛，她们说，这孩子要好好教育，不能让他养成随便打人的恶习。这事要在全班做检讨，写保证书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跟爷说，是他们先打我的。我爷说，你以后离他们远点。又问：我刚才打痛你了？唉，我要是不打你，她们怎么出气啊？……几十年过去，我爷当时说话的神情依旧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想起来就心酸、屈辱！

我这么检讨和写保证书：“……以后只要同学不欺负我，我也绝对不欺负同学！”

这样的检讨和保证书怎么通得过？就在这时，“文革”来了！说句不恰当的话，“革命”为我解了围啦！

学校成了革命的战场，校长、书记、老师一个个被揪出来啦，那个不主持公道的班主任，被革命小将查出，她家出身是地主，可是她填写的成分是上中农，这不就该批倒批臭吗？我记得，那些日子我特别兴奋，有种“报仇雪恨”的快意耶！我上台发言，说她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，歧视、欺负劳动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🕯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阿贵 文字整理/许晓铭

我的兄弟们

人民子女，那个时候，就是这样的语境唉！

浑浑噩噩混到了小学毕业，然后去了离家最近的那所中学。那个时候，我的名气已经蛮大，也会说一口带着苏北腔的上海话了。

进中学不久，八班的国宝就主动找我来了，要和我交朋友，他蛮诚恳地告诉我，他家住在某某新村，他原先就读某某小学，他们是他们小学的“名人”，“老师同学都服帖我的”。他说，听他们班的同学说，我在小学也是“名人”，所以，想跟我交个朋友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我格楞都不打的立刻响应：“好！”

●结识国宝，我有了找到同类、知音、兄弟的感觉！我们俩有很多相像的地方，譬如，孝敬爷娘，讲情意、义气，不欺负弱者，不惧怕不讲游戏规则的“强者”，我们俩是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！我比不上国宝的是他的聪明，国宝看问题、考虑问题绝对有水平哦！难怪啊，人家后来受党栽培，做了几千人大厂的厂长！

后来国宝把四班的建光介绍给我，那也是一条好汉！三个好汉一个帮，不久，我们兄弟仨的名气就大过了红卫兵团长。说那个点，我们就像是水浒好汉，除暴安良、保护弱者，但是，在正统的老师、学生眼里，我们绝不是好汉，而是打入另册的流氓、问题学生。学校有时候搞什么大批判、大批斗活动，会在大喇叭里点我们的名，甚至把我们揪到台上示众。弄得我们像是坏分子，过街老鼠一样。正是叛逆期，学校这样的做法，让我们非常反感，内心充满了仇恨，我们做出的反应，不是他们希望的“悬崖勒马”，而是用无所谓、不在乎的态度表达我们的反抗。

初二了，我们感觉自己长成了大人，于是开始学抽烟，我们三人中，建光家的经济条件最好，每个月有一元零花钱，本着“有福同享”的“原则”，那一元钱是我们的“共享基金”，我和国宝偶尔有几个几分毛的，也拿出来共享的。那时物价便宜，我记得飞马牌香烟是0.28元一包，大前门是0.35元一包，我们每个月都会买上几包烟，避开大人吞云吐雾。

国宝班上有个学习成绩很好的男同学，马耀年，这人很斯文，老师们都很喜欢他，但是男同学看他不顺眼，为什么不顺眼？也许他成绩太好了，让学渣们不爽？或者是他性格太懦弱，把别人欺软怕硬的毛病激活了？不晓得。有次，他被同学打了，打得蛮厉害的，他躲在男厕所边哭边用自来水洗鼻子里流出来的血，这时正好国宝上厕所，见他这样，就问，谁打的？为什么？马耀年是个书笃头，这样回答，说他们之前欺负我，我告诉老师，老师训了他们，他们就打我了。国宝说，你等着，我去为你报仇。

国宝把我和建光招来，如此这般一说，我立刻想到自己小学时被同学欺负的情景，不同的是，马耀年有老师撑腰，而老师的撑腰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全，因为，中学生了，老师的管教不那么起作用了。

我们仨找到欺负马耀年的那几个男生，什么都不说，上去拳打脚踢教训了他们一顿，然后，国宝警告他们：“你们以后再敢碰马耀年一根指头，我对你们不客气！”从此以后，没有人敢欺负马耀年！

后来，马耀年也成了我们的弟兄。国宝说，他对马耀年的好感，恰恰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的优异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学霸！我们后来才知道，他爷娘都是大学的教授，不得了！马耀年加入我们的“队伍”，除了感激国宝的“路见不平”一顿打以外，再就是为了寻求长久的安全吧？跟我们一起，谁敢欺负他？

马耀年家境好，不但买烟给我们抽，还请我们去小饭店打牙祭。他的慷慨大方，让我们对他充满好感。

一转眼，中学毕业面临分配了，国宝一工一农，被分配去了金山石化，我家是二农一工，硬档工矿，去了海运局，建光和马耀年去了崇明长江农场，四年的兄弟情，被一纸分配通知书弄得很伤感。清楚记得，我们四个在江湾五角场那家外面下大雨、里面就会下小雨的破饭店聚餐，清楚记得那家破饭店的模様，烂泥地，灰不溜秋油腻腻的墙面，油毛毡、毛竹搭的三角屋顶，几十年过去，破饭店灰飞烟灭，那个地方现在是万达广场啦！破饭店很灰暗，白天都要开灯的，那时，啤酒八分钱一杯，我们四人喝了二十多杯，下酒菜是三分钱一个的酱麻雀，五分钱一碟的油余花生米，七毛钱一斤的白切猪头肉，二毛四一盘的清炒猪肝，那顿酒花了七块多，马耀年掏的腰包。

国宝说，我们兄弟一场，现在就要各奔东西了，但我们还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兄弟！他又嘱咐建光，到了农场，要是有人欺负马耀年，你要为他撑腰出气！我们有机会还是要聚的……

我在海上漂，国宝在金山，他们两个在崇明，再也不能像学生时代那样可以天天厮守在一起了，最初的几年，我们差不多就是过年的时候相聚，记得，那年我休长假，国宝也请了假回到市区，我们俩每人拿出5元钱，买了香烟、点心什么的，跑到崇明探望建光和马耀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两个是上海工矿，条件比他们好呀！我们在崇明一共住了四天。

学校给我和国宝写在档案里的评价，蛮差的，所以，刚进单位的时候，领导对我们都是“另眼相看”的，这体现在分配的工种上，国宝当了装卸工，我是水手。但是我们两个都很争气，干活不捣浆糊，跟同事的关系也处理的不错，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朝前朝上走的，国宝厉害，大组长，工段长，车间主任，四十九岁就做副厂长了，人家是有能力呀，我不行，我文化程度不行呀，我们头头也蛮器重我的，送我去大连海运学院读书，说要培养我，我双手作揖说，饶了我吧！我不是读书的料，这个好机会给别人好了！头头看不懂了，介好的机会，稍微拎得清的人千方百计要抓住的，这是镀金啊，出来就是干部了呀！我说，我是做生活的命，不想捣浆糊，读不进就是读不进，谢谢你了！我这样做，头头是更加看得起我了，感觉我实在啊！

●九十年代，我们开始跑远洋了，人很辛苦，但是收入绝对高，我后来发奋图强，做到了三副，我觉得，我这样一个人，做到这个位置，除了我自己的努力，还有就是单位领导对我的认可，老天厚待我啊！

马耀年后来考取了交大，人家就是学霸啊！1987年去了美国，现在在美国杜克大学的终身教授。

建光顶替他娘去了上海电电厂，九十年代，工厂改制，他下岗了，不久，查出罹患晚期肺癌，得知自己的病情后，他很想跟我们兄弟再聚一次，不知怎么搞的，竟然没有联系到我们。我们是十几年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。

我们各自成家立业后，因为家庭和工作的关系，渐渐疏远，以至于失联了将近三十年！国宝办法多啊，后来通过公安局找到我的，久别重逢，两个老男人眼睛里居然都是泪！